



媽祖信仰と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粵人の海上活動 : 東粵の著名な海港の研究を中心に

陳, 春声

(Citation)

海港都市研究, 3:3-14

(Issue Date)

2008-03

(Resource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Version)

Version of Record

(JaLCD01)

<https://doi.org/10.24546/81000028>

(URL)

<https://hdl.handle.net/20.500.14094/81000028>



妈祖信仰与明清时期粤人海上活动 ——以粤东一个著名港口的研究为中心——

陈 春 声
(CHEN Chunsheng)

从 1991 年开始,笔者多次在广东省东部澄海市(1994 年以前为澄海县)的樟林乡进行乡村社会史的田野调查。根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所得,作者发现,该社区存在的四座天后庙及其相关传说的演变,与村落历史和社区性质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解释,说明华南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天后信仰,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其功能与意义的变换。

I 樟林的历史与四个天后宫的分布

樟林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北部。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 年)饶平县设县以前,此地归潮州府海阳县管辖,成化十四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隶属饶平县,嘉靖四十四年澄海设县以后,樟林逐渐成为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樟林作为一个聚落,是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为了抵御倭寇、海盗而形成的。在此之前,樟林“先民”是一些散居在现在的樟林乡北面的莲花山麓的渔民或蛋户,现存于莲花山麓石壁头地方的灵感宫旧址,清代以来,一直被当地文人视为开村以前先民一再当地居住的历史证据。

嘉靖三十五年樟林聚落的形成,是当时潮州乡村社会军事化、聚落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其直接原因是沿海地区盗乱不止,地方动荡。¹樟林开村以后,还经历过多次被海盗破寨掳掠的事件。反映这一过程的,是有关“暗芒宫”妈祖的灵验传说。据说,“暗芒宫”原位于村外的沙埔(红肉埔)之上,后来因为兵祸移建村南的官道(樟东路)旁。清末香火逐渐衰落,现已不存。

樟林及其周围地区,迟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海禁”之后,樟林逐渐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乾隆、嘉庆年间樟林港贸易达到其全盛时期。²贸易的发展,促使商人、船主以及其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各色人

1 《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版。

2 关于清代樟林港的贸易情况,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例如,可参见田汝康《17—19 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页 18--19;张映秋《樟林港埠与红头船》,《汕头文史》第 8 辑;林远辉、张应龙《潮州樟林港史略》,《海交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1993 年第 1 期;《泰国潮州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第一期·樟林港(1767-1850)》,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

等云集樟林，港口两岸出现了新兴街等新的商业街区，乾隆末年在港口的近海处兴建了当时广东全省规模最大的天后宫——新围天后宫。

随着帆船贸易的发展，樟林社区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乾隆中叶以后，社区中心出现了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和仙园等八个商业街区，加上其周围的东社、西社、南社、北社、塘西社和仙陇社，形成了所谓“六社八街”的格局。³ 在社区的中心，当地居民兴建了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的“城内天后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距樟林仅 30 余公里的汕头成为新增的通商口岸。从此之后，樟林港在传统时代作为“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⁴ 的景象一去不复返。在此期间，樟林最明显的变化是，本地人大量出洋谋生，侨居海外，整个社区的生计和地方建设越来越依赖于侨汇，终于由传统贸易港口衍变为一个典型的侨乡。⁵ 在这一变化中，新围天后宫逐渐衰落，而城内天后宫则由于地处社区中心，其传说包涵了与华侨出洋有关的内容，仍然香火兴旺。

对本研究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长达数百年的社区发展过程中，有关这些天后宫的灵验传说和后人对天后宫历史的解释，是如何创造、变异和流播的。

II 灵感宫与关于开村前历史的传说

根据 1981 年 8 月在当地发现的从明代嘉靖至清代嘉年间的一批地方档案的记载，从元代至明中叶，樟林村的居民一直散居在今樟林北面的莲花山麓，由蔡厝围、程厝围、周厝围、驿后、胜塘、后沟、小陇、大陇等小乡里组成，归东陇河泊所管辖。⁶ 东陇河泊所是当时潮州府的三个河泊所之一。⁷ 据《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释疑》载：

至我滨址，则有微殊者。地临海滨，田地希隘，资海为生者甚多。历来赋役有三：一曰军役，明洪武三年设御海氛，有事捍海，无事耕种，此隶于指挥者也；二曰鱼役，明洪武十四年初征渔舟输米，以供军贡，以防卫于我者，此隶于河泊者也；三曰排户，

1991 年版。

3 有关樟林社区历史的发展和街区的变化，可参见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版；陈春声《〈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潮学研究》第 1 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 尹佩绅《樟林镇鼎建风伯神庙碑记》（嘉庆二十四年），《凤山记序》，道光七年刻本，页 21a--25b。

5 可参见陈春声《“八二风灾”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以樟林为例》，《潮学研究》第六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6 《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释疑》。

7 《明会典》卷 36，课税五，渔课。

明成化十四年新置饶平，按十家保聚，以地之出，供上之赋，使司□*于我者也，此隶于县令者也。此者皆历来供赋之谓也。

这段史料对理解作为一个聚落的樟林开村前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军役和渔课始征于洪武年间，是明代蛋户和渔户承担的主要赋役。成化十四年以前樟林居民仅有这两种赋役，说明其生计应以渔业为主要来源，组成“樟林村”的各个聚落单位都是小渔村。

关于这段开村前历史的细节，当地人已不甚了解。清代康熙和雍正两个版本的《澄海县志》，在记载“樟林寨”时，都回避记载城寨建立的时间。⁸ 到嘉庆三个版本的《澄海县志》，则把作为开村标志的“樟林寨”建立的时间误记为“创自明初”，⁹ 在1981年上述地方档案被发现之前，当地文人在笔记、乡土志等记载中也接受县志的这一说法，而不知建寨的确切年份是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三十五年。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先辈以渔为业，居住于莲花山麓的若干小渔村这一点却坚信不疑，并流传着许多与开村有关的历史传说。他们用于支持这种信念和传说的主要根据，就是至今尚存的位于莲花山南麓石壁头地方的祭祀妈祖的“灵感宫”遗址的存在。

“灵感宫”现在被当地人依谐音转称为“娘感宫”，是一座极不起眼的蕞尔小庙：

灵感宫在石壁头山脚下，宽广数尺，正中有浮雕石壁，天后肃穆居中而坐，二使女侍于两侧，宫门横额镌“灵感宫”三字。¹⁰

康熙年间自称为“上林氏”的一位当地乡绅指出，开村之前“灵感宫”就是莲花山边的若干小村落的“境主”：

尝考山边草洋内则有陆厝围，坑埔之南则有周厝围，此乃前人屋居，后搬为田。至万历、崇祯又遭水堆积为埔，本里各姓俱有田在焉。又石壁头小墩下则为境主天后娘灵感宫，驿后、胜塘、后沟则为诸姓里居。此先人传习，以为元初之烟址也。¹¹

当地文人相信“灵感宫”建于元代，并以此作为樟林人早已在本地定居的历史证据，是经过一番细致的考据的：

* 编辑部注：□是由于日方编辑中的问题不能印刷起来的字。

8 康熙《澄海县志》卷4，城池；雍正《澄海县志》卷6，城池。

9 嘉庆《澄海县志》卷3，城池。

10 黄光舜《闲堂杂记》卷4，附录，灵感宫（1996年铅印本）。

11 《樟林乡土史料·古迹大观》。

从宫名冠以灵感二字推断，此神宇当建于元代中后期。元文宗天历二年，加海神天妃封号共八字，其首两字为“灵感”，加后之全封号为：“灵感助顺福德徽烈广济辅圣庇民显佑护国明著天妃”。四十三年后之明太祖洪武五年改封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又三十七年后之成祖永乐七年再改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慈弘仁普济天妃”。樟林先民名天妃宫不用汉人封号而用蒙古人封号，其原因只能是此神庙之盖建，当在元文宗天历二年之后，元王朝覆灭之前，至迟不下于洪武五年。¹²

实际上，历代皇朝对天后的褒封，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版的《敕封天后志》记载，与天后信仰有关的敕封中，“灵感”二字最早是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出现的，是年天后之父被加封为“灵感嘉佑侯”。而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对天后的封号则为“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¹³与前引之考证不同。另外，据明末清初成书的《天妃显圣录》记载，天历二年的封号是“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¹⁴《敕封天后志》中的“灵感”二字在成书更早的《天妃显圣录》中被记载为“灵威”。更有意思的是，成书更早的《元史》的记载又与上引说法不同：“（天历二年冬十月）己亥，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赐庙额曰灵慈，遣使致祭”。¹⁵对天后信仰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的李献璋教授，据此认为《天妃显圣录》“列举的神号很多不正确，……诰文中的‘诰封二十字’，恐怕是‘一十字’的误抄，我觉得记作‘二十字’是恣意集中封号凑数”。¹⁶可见，讲元代天妃的封号已有“灵感”二字，很可能是清代人臆想的结果。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樟林人把壁头天后宫的庙名，作为推断先人活动遗迹的证据。

本世纪50年代初，灵感宫被毁，只剩下淹没于草丛之中的刻有天后和两位侍女像的一幅不大的浮雕。但这个庙宇曾经存在的事实，仍然被当地人不断的强调，因为它已经视为村落的历史渊源主要标志。原樟林中学校长、本地公认的对樟林地方史最有研究的学者李绍雄先生，于1990年出版很有影响的《樟林沧桑录》一书，该书一再提到“灵感宫”的存在，强调：

从宫的命名和建筑形式看来，灵感宫建于元初。作为樟林先民的‘元初烟址’的标志，应是可信的。¹⁷

12 黄光舜《闲堂杂记》卷4，附录，灵感宫。

13 乾隆《敕封天后志》卷二，褒封。

14 《天妃显圣录》卷下，历朝显圣褒封。

15 《元史》卷33，文宗本纪。

16 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中译本），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页110。

17 李绍雄《樟林沧桑录》，政协澄海县委员会东里镇联络组、澄海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络会1990年铅印本，页18。

III “暗芒宫”传说与开村初期的社会动乱

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社会激烈动荡。从嘉靖年间开始，潮州一直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当时地方社会“民”、“匪”难分，政府军事力量严重不足，结果官府只好多次“通行各县，谕令小民归并大村。起集父子、丁夫，互相防守”。¹⁸由此促使潮州沿海的聚落形态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现在潮州地方所见许多大的居民点，都是这个时期由一些散居的小村庄归并而成的。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嘉靖三十五年，原散居于莲花山麓的各村共15姓居民得到官府批准，于山下官埔合村筑寨居住，是为作为一个聚落的樟林“开村”之始。筑寨合村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防御倭寇和海盗的骚扰，当时各村里甲排年户丁蓝城居等呈送潮州府的《建寨呈文》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

居等海滨蚁民，命乖运蹇，居址莲胜荒丘，三五成室，七八共居。可为生者，耕田捕海；遵治化者，变物完官。前属海阳，今隶饶平，课排军民，凜分赫然。何今复为不幸，倭寇猖獗，东海汪洋，无可御堵，西土孔迕，难以救援。况又河口头军卫、驿地步兵，各自保守，庶个穷黎，哀救无门，家室所有，悉为洗论。惨惨哭哭，莫可乃何。今遗余苏，商度计阻，必合聚筑，稍能存生。故本年三月合集众村移会南面官埔创住。但斯地樟林、□楠丛杂，可为屋具，四面沟湖深曼，可为备防。然又众庶激奋，欢愿捐资筑防……¹⁹

不过，城寨的建立并未意味着灾难的结束。从嘉靖末年至清代康熙初年，潮州地区与整个东南沿海一样，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山贼、海盗为祸，南明与清兵拉锯作战，以及“迁海”等一系列动乱事件的冲击，地方社会一直处于动荡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樟林在嘉靖至崇祯年间多次被海盗进袭，不断经历着建寨——破寨——再建寨——再破寨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有关这一时期本地天后崇拜的传说，也与海盗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樟东路天后宫，原名暗芒宫，年久后人误为暗巷宫。昔日乃祀于红肉埔村内。

当日王化未敷，沿海皆盗。红肉埔亦是盗窟。独一妇性甚贞洁，虽居盗窟而不为盗，率子业渔。

该村屡犯劫案，官府派员侦缉，有伪饰补□者，见该村出补竹器，多遗芝麻器中，

18 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海寇。

19 《樟林乡土史料·建寨呈文》。

察其居民，原非业农，何多有此物。而近一船被劫，恰多载芝麻，则该村所劫无疑。官府遂（派）大军，乘贼人除夕必尽回家度年，一网打尽之。

因此妇本属善良，王兵来剿，玉石岂有辨乎？可是心地光明，吉祥自为之呵护，古人之言果非妄语。此妇先于前日白昼遇一老姥，谓之曰：“妇，汝不日若见龟爬出门限，大祸即至。宜即刻逃出里外以避之，且必负我同走。切记”。言讫，转眼不见。知为神明下示，遂牢记心中。至除夕祭祀祖先，桌上有此壳龟不觉倾落地上，拾之，更有跳出门外者。一时触动上日神明嘱语，必是宫中圣母。时已入夜，遂率其子收拾细软物件，同入宫中，背了圣母神像，逃出里门。官已来围捕矣。母乃匿暗芒中，因得免祸。

益感天后神恩，后遂建庙于此，故名暗芒宫。²⁰

这个传说的蓝本是当地相当有名的“劫皇姑船案”故事：“野老相传，明之中叶，有皇姑楼船从此经过，沿海诸盗纠而劫之，红肉埔贼亦与焉”。²¹其时正是樟林开村前后的事情。“暗芒宫”实际建立的时间已不可考，有意思的是，这个流传至今的有关妈祖显灵的传说，与我们对明代中后期当地社会环境的了解竟如此的一致。²²

对本研究而言，这个传说中最有意思的内容有二，一是当时本地人“盗”、“民”难分；二是官兵平盗时玉石俱焚，百姓有散居小村迁入防守严密的城寨，与其说是防盗，更不如说是为了躲兵。而这些正是该时期潮州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红肉埔”位于樟林村南面，早已无人居住，现在农民在此地耕作时，有时还可挖到一些烂砖破瓦，樟林人讲就是所谓“红肉埔村”的遗存。在以上的传说中，天后为了逃避兵祸而迁居樟林，这也正是明代中后期樟林人自己的经历。

IV 樟林港兴起与新围天后宫的建立

如前所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之后，樟林由于其位于“河海交汇”之区，有最便捷水路通往府城和韩江上游的有利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当时最著名所近海帆船贸易口岸之一，乾隆、嘉庆年间樟林港贸易达到其全盛时期。在此期间，各地客商、船户和其他外来人口大量到樟林定居，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嘉庆年间任澄海知县的尹佩绅这样描

20 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怪异》（民国34年稿本）。文中，“口”是一种竹编的晾晒用品，“此壳龟”潮州地区过年时用来祭神的一种用野菜和米粉等做成的食品，“暗芒”是一种茅草。这三个词汇都是用潮州话谐音字记录下来的。

21 参见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笃行与贞节》。

22 参见陈春声《嘉靖“倭乱”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可参见陈春声、刘志伟《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的军事化》。

述樟林的贸易地位：

樟林，澄之钜镇也。……澄滨大海，民多业于海。樟林尤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也。²³

就在樟林港贸易最繁盛的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间（1787—1792年），在接近港口入海的新围地方，修筑了当时广东省最大的天后宫（图三）。这座天后宫的建筑据说是以福建泉州的天后宫为蓝本的，其形制和规模至今仍被当地文人引以为荣：

全座结构紧密，建筑形式为中轴线宫殿式建筑。计有正殿、前栋、梳妆楼（望海楼）、拜亭、东西两庑及周围埕道、后座、戏台等，占地数亩。……大门前有池塘，塘边巨型灰狮一对，高二米余。门前石狮、石鼓各一对。大门后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写的“海国安澜”巨匾。²⁴

在新围天后宫东西两庑有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的22块建庙捐款碑，从碑记的内容可以看出，捐款者包括了粤东、闽南沿海数县的官员和士绅，也包括了来自韩江上游的嘉应州和大埔县的信众，而最主要的捐献这则是樟林港的“商船户”、“众槽船舵公”和商号。每年天后诞时，前来拜祭的包括了闽粤交界地方数县的信众。

本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在进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课题的研究时，曾在樟林做过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有关天后的“灵验”故事，都与航海安全有关。试举一例如下：

汕头某村（即樟林：引者注）有一位绅士，其曾祖尝和暹罗通商。有一次其“红头船”遭遇极大的危险，一日某绅以其曾祖的“像赞”示著者，内有一段说：

“曾祖考讳仆字仁灼，前朝敕授儒林郎，六品封典。祖即高祖峰之五公子也。自少习庭训，长兴航业。中途遭飓风，飘流琉球百岛，船及货物均为岛民吞没。祖只身背神像渡海，得达山东，行乞以归，已一年矣。当时家人闻船漂落无踪，意谓沉没，即居丧如礼，庆归服除。祖至是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再向亲友借贷造船，航往南北两洋。惜所运仅木材树皮诸贱物，不能获利，晏如也。会星洲烟土跌价，勉办多少，回国运往上海。船次崖门，门吏以此船向运贱货，免查挥去，抵上海烟土获利甚丰。惊识广东烧烟起衅，崖门不查，化祸为福，迨天赐欤？遂捐资修黄河决口，使臣嘉许，达部册封”。²⁵

23 尹佩绅《凤山记序》，“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

24 李绍雄《樟林沧桑录》，页41。

25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页45—46。在该书页278，陈达再次讲到这个

新围天后宫因为其建筑规模巨大，建筑精美，一直被视为樟林古港最重要标志物。樟林的多座天后宫中，只有新围天后宫被载入《澄海县志》。²⁶ 本世纪 40 至 60 年代，李献璋先生在从事《妈祖信仰研究》一书的写作时，也注意到新围天后宫的存在。²⁷ 当代学者在论述广东的天后信仰时，仍然会提到新围天后宫规模居全省之冠：

乾隆年间樟林兴建的一座新天后宫（当地人称妈祖新宫）占地近十亩，历时六年，宏规巨制、堂皇壮丽为粤东之冠，这与当时樟林在粤东的经济地位适相匹配。²⁸

不过，在田野调查中作者的一个深刻印象是，由于新围天后宫的创立者有许多是外来的官员、商人、船主和水手，其祭祀范围也远远不只限于樟林一乡，这个后来被外来的访问者高度重视的庙宇，与社区内部的社会生活似乎联系比较疏远。在樟林还是一个贸易口岸的时候，许多外来的客商、船户、舵公等在此居住，他们的信仰和财力足以支持一个大规模庙宇的运作，天后宫与社区内部的关系亲疏并不直接对庙宇的命运产生影响。但是，一旦港口衰落和社区性质发生变化，情况就不同了。

咸丰以后海上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汕头开埠和机器轮船的使用，导致了樟林港传统贸易方式的衰落，《樟林乡土志略》记其事曰：

咸丰之世，红头船（即洋船）改变为甲板船，不多时又由甲板而变为火轮船。樟林口岸无形中移出沙汕头。²⁹

港口衰落以后，樟林作为一个侨乡继续发展，从海外流入的大量侨汇使其财富积聚过程延续了下来，华侨回到故里建设“新乡”积极活动，使整个社区面积在清末民初扩大了差不多一倍。

但是，由于庙宇的主要支持者的离开，新围天后宫日渐破败。经过 1918 年的八级大地震和 1922 “八二风灾”，天后宫的大门和正殿倒塌，仅余两庑和殿后的“梳妆楼”。1949 年以后，其地成为民居。近年在此居住，自称来自莆田的林姓人家，重新为天后设立小神龛拜祭，但香火极为稀落。而且，根据调查时得到的印象，这些自称妈祖后人的林姓人家在此居住，其目的与其说是要延续妈祖的香火，还不如说是为了等待这个已经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

故事，并说明遇险时所背神像“即‘天后圣母’”。

26 嘉庆《澄海县志》卷 16，祀典。

27 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中译本），页 154。

28 陈忠烈《明清以来广东民间“天后”女神崇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

29 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乡民生计》。

保护单位，而且时有重建呼声的庙宇修复时，得到一笔搬迁的补偿费。

与本地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围天后宫在潮汕移居海外的华侨中仍有很大影响，泰国、香港等地潮州同乡会组织出版的多种刊物，都以较大篇幅介绍新围天后宫，每年有不少华侨到其遗址参观，并捐款筹建以天后宫为中心的樟林古港公园。地方上的文人和文博单位，也对其表现出很大热情，除将该庙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多次要求政府出面组织修复工作。

不过，迄今为止，恢复新围天后宫的工作并无实际进展。

V 城内天后宫与有关“亥爷”的传说

前述三座天后宫实际上都位于社区以外，真正位于樟林社区内部的天后宫是乾隆五十九年在樟林城寨内修建的“城内天后宫”。如前所述，“城内天后宫”建在城寨中央两条主要街巷的交汇处，但传说中庙宇的建立不具有官方色彩，甚至也不是由乡众或其他信众合力建筑的，而完全是本地一个姓林的商船船主个人出资修建的。

“城内天后宫”规模不大，只是一间面积约20平方米屋子，神台的摆设与我们在潮州地区所见的一般天后宫并无二致，中间是天后，两侧为花公花妈和福德老爷，神台前面的供桌上站着千里眼和顺风耳。庙宇内部布局最不平常之处，就是在天后像右前方的庙门一侧，有一头面对天后、虎视眈眈的大猪塑像，当地人称之为“亥爷”。目前城内天后宫在樟林各座天后宫中是香火最为鼎盛的，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对该庙的宗教热情，不仅仅出自对妈祖的崇拜，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当地流传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亥爷”的传说。

城南门内天后庙，乾隆壬子年北社和春号红头船船主林某所建。相传某幼年失怙，家境贫寒，母思再醮，方处村外，有大猪挡路，污了衣裳，乃委诸天意，绝再嫁之念而矢志抚孤。后某行洋船起家，盖建此神宇，因感念前事，特塑泥猪一头，拜祀庙内，与血食焉。樟林谚曰：‘亥爷得饭妈祖福’，即指此。³⁰

听了这个在本社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后进入天后宫，总是免不了产生“亥爷”蹲在门口是为了防止天后出门的联想。“亥爷”的存在及其相关的传说，破坏了天后宫应有的大度、端庄、和谐的气氛，使人想到社区内部唯一的这座天后宫，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天后的信仰，还不如说是这个成年男子常出远门的侨乡和港埠对在家妇女贞操的关注。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天后作为女性的象征，实际上受到的是歧视，甚至是亵渎。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故事使城内天后宫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一直香火旺盛。

30 参见黄光舜《闲堂杂记》卷4，附录，亥爷。

实际上,城内天后宫是目前樟林社区中唯一“活着”的,仍有较多信众,每年三月初三“天后诞”时有众多的妇女前来拜祭的天后庙。城内天后宫至今仍保持生命力的理由可多方面理解,包括庙宇位于社区中央,来往方便,容易进入平常百姓日常生活的“视野”;传说中这个庙宇的建设者是樟林本地人,他的生活经历代表了樟林人心目中的成功者的“理想模型”;传说的内容虽然不算文雅,但却充分表达了普通女人生活的艰辛,较易引起一般人同情的联想等等。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在现代的口头传说中,林姓船主的身份变成到南洋“过番”的华侨,他发财后回家探母,听母亲讲了前面的故事,就建了这座天后宫³¹。这与清末以后樟林人大量出洋,樟林成为著名侨乡,百姓日常生活和社区公共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侨汇的历史变迁,是相吻合的。而且,传说内容的适当“修正”,也吸引了不少从海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前来拜祭。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樟林四个天后宫的历史变迁及其相关传说,在不同历史场景下表达了不同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据说在社区发展不同阶段建立的这四个天后宫,其相关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不同阶段历史的特点。以往有关村庙的灵验传说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考察这些传说所蕴涵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传说所反映的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我们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明,在一个有较长时期的文献性历史记录的社会里,对灵验传说的解读,还有助于对乡村发展历史的理解。

我们知道,在村庙的实际运作中,灵验故事的创造与流播,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与庙宇活动有关的信众和周围的人们,每天都在重复他们知道的传说,同时他们也参与了故事的“创作”与“再创作”,通过这样的过程表达、宣泄自己的体验、情感和生活目的。樟林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实际上可能对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传说进行了某种“选择”,使传说中与实际历史过程相契合的内容,在漫长的流播过程中,得以保留下来。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

从樟林的故事还可以看出,这种“集体记忆”,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有很大的不同。在调查中我们就发现,有关“灵感宫”、“暗芒宫”的传说,只有退休教师等对地方文史有兴趣的本地文人才系统了解,一般百姓大多更有兴趣的是“亥爷”的故事;对于海外华侨和社区外面的研究者来说,樟林的标志就是“新围天后宫”,可是樟林当地人,不管是文人还是一般百姓,似乎对“新围天后宫”的活动比较缺乏兴趣,有关这个庙宇的灵验故事,是因为陈达教授的记录才为我们所知。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实际上不同人群对社区历史的不同感受和理

31 乾隆《敕封天后志》卷二,褒封。

解。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对庙宇的传说的解读，实际上是对不同的人有关社区历史的“集体意识”的了解，这是一种“理解之理解”。

（中国广东 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学系）

日本語要約

媽祖信仰と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粵人の海上活動
——東粵の著名な海港の研究を中心に——

陳 春 声

広東省東部の澄海市樟林郷は、広東・福建間の潮州の文化圏に属するが、嘉靖 35 年（1556）に倭寇と海賊防御のため集落が作られた頃は、その住民は漁民か海上生活者で構成されていた。本稿は、この樟林に残された 4 つの媽祖廟とそれに関連する民間伝承を、フィールド調査を通じて復元することで、華南地域に広く存在した媽祖信仰の歴史的変容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である。

嘉靖 35 年以前、樟林の先住民は北部の蓮花山麓に居住していた。そこには漁民の航海の安全を守る「靈感宮」があった。明代中期以後、この地域は農民反乱と倭寇の侵攻を前に大きな社会変動にさらされる。倭寇と海賊に対する軍事的防衛を神に祈るため、民衆は村外の紅肉埔に「暗芒宮」を建てた。媽祖伝説はここにおいて海賊の物語と結合することになった。康熙 23 年（1684）の鎖国政策を契機に、樟林は帆船貿易の中心港として空前の繁栄を遂げ、当時としては最大規模の「新厝天后宮」が海につながる河口沿いに作られる。広東東部や福建南部の広範な地域の紳士たちがそれを経済的に支えるのである。しかし、アヘン戦争以後、海上貿易の中心が近隣の汕頭へと移ると、樟林は貿易港として衰退の道を辿る。このとき、新たに城内に作られた「城内天后宮」は、「亥爺」と呼ばれる大猪に廟門を守らせて、衰退した樟林から媽祖の女神が立ち去らないようにという民衆の願望を託したのである。

「靈感宮」「暗芒宮」「新厝天后宮」「城内天后宮」という 4 つの媽祖廟とそれに関連した民間伝承は、相異なる時代における民衆の「集合的記憶」あるいは「理解の理解」を表象するものに他ならなかった。

(作成：神戸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 緒形康)